

产业扶持政策与劳动收入份额

——来自地方政府五年规划文本的证据

金荣学¹, 张双龙¹, 刘 奥²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2.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142)

内容提要: 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应持续优化初次分配格局, 提高劳动者劳动报酬。产业扶持政策作为“有为政府”的强力抓手, 不断增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同性, 并影响企业初次分配格局。本文立足于地方政府, 归纳地方政府出台的重点产业扶持政策, 并借助 2008-2015 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深入剖析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发现, 地方产业扶持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其对非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更明显; 劳动密集度越高, 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效果越大。指标分解的机制检验发现, 地方产业扶持政策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平均工资来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传导机制检验发现, 地方产业扶持政策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生产技术升级和市场竞争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拓展分析结果表明, 社保缴费负担对地方产业扶持政策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效应具有调节作用, 其效果在社保缴费负担较低企业更明显。本文不仅有助于完善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增强产业扶持政策协同性, 同时还为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推动共同富裕以及扩大内需战略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 地方政府 产业扶持政策 五年规划 劳动收入份额 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 F014.4 **文献标识码:** A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and Labor Income Share:

Evidence from Five-year Plan Texts of Local Governments

Jin Rongxue^a, Zhang Shuanglong^a and Liu Ao^b

(a.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b. Chinese Academy of Fiscal Sciences)

Abstract: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e should continue to optimize the pattern of primary distribution and increase the labor remuneration of workers. As a strong lever for "active government",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continuously enhances the synergy between "active government" and "effective market", and affects the ini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local governmen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key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issued by local governments,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on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enterprises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with the help of national tax

survey data from 2008 to 2015. The results show that local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of enterprises, and their effect on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of non-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s more obvious. The higher the labor intensity, the greater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on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of enterprises. The mechanism test of index decomposition shows that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mainly increases the share of enterprise labor income by increasing the average wage of enterprises. The test of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shows that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can increase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of enterprises by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promoting production technology upgrading and market competition. The extended study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soci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 burden on local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on promoting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of enterprises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and its effect is more obvious in enterprises with low social insurance payment burden. This paper not only helps to improve the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enhance the synergy of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but also provides useful policy enlightenment for optimiz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patter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Keywords: Local Governments;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Five-year Plans; Share of Labor Income; Income Distribution

作者信息:

1. **金荣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电子邮箱: 2208174548@qq.com; 联系电话: 13986278521。

2. **张双龙 (通讯作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 zslong09@126.com; 联系电话: 13208952186。

3. **刘 奥**,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 eva669921@126.com; 联系电话: 19307157822。

邮寄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南湖大道 182 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文泉楼北 501

邮编: 430073

联系人: 张双龙

电话: 13208952186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深化‘放管服’改革与发展软环境研究”(基金号: 19ZDA110)和碳排放权交易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开放课题重点项目“碳税与碳交易形成价格机制的比较研究”(基金号: 22CICETS-ZD009)的资助。

产业扶持政策与劳动收入份额

——来自地方政府五年规划文本的证据

内容提要：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应持续优化初次分配格局，提高劳动者劳动报酬。产业扶持政策作为“有为政府”的强力抓手，不断增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同性，并影响企业初次分配格局。本文立足于地方政府，归纳地方政府出台的重点产业扶持政策，并借助 2008-2015 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深入剖析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发现，地方产业扶持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其对非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更明显；劳动密集度越高，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效果越大。指标分解的机制检验发现，地方产业扶持政策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平均工资来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传导机制检验发现，地方产业扶持政策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生产技术升级和市场竞争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拓展分析结果表明，社保缴费负担对地方产业扶持政策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其效果在社保缴费负担较低企业更明显。本文不仅有助于完善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增强产业扶持政策协同性，同时还为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推动共同富裕以及扩大内需战略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地方政府 产业扶持政策 五年规划 劳动收入份额 收入分配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是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李实，2021；宫汝凯，2023）。然而，当前中国的要素收入分配还存在较多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相比英法等发达国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一直处于较低位置（刘长庚和柏园杰，2022）。劳动收入份额的过低不仅影响要素收入分配格局，还不利于经济平衡发展和社会稳定（Autor et al., 2020；孙豪和曹肖焱，2022）。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都明确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对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增进人民福祉、实现扩大内需战略具有重要作用，还关乎我国能否在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伟大目标。

现有文献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并试图找到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关键因素。在宏观层面，已有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调整（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Karabarbounis & Neiman, 2014）、经济开放（王雄元和黄玉菁，2017）、结构转型（郭凯明，2019）、劳动力市场制度（Ciminelli et al., 2020）、市场集中度（Barkai, 2020）以及自动化（Acemoglu & Restrepo, 2020；何小钢等，2023）等因素均能影响劳动收

入份额。在微观层面，已有研究发现资本市场配置效率（施新政等，2019）、税收征管（杜鹏程等，2021）、政府补助（詹新宇和余倩，2022）、要素成本变化（杜鹏程等，2022）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肖土盛等，2022）等因素均能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已有研究认为政府制度因素或多或少都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虽然已有众多研究从制度因素探讨了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但目前鲜有文献关注产业扶持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效应。产业扶持政策作为地方政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工具，不仅会影响企业绩效，还会影响企业间的收入分配。一方面，产业扶持政策对重点行业的资源性倾斜将影响人力资本结构，进而影响微观劳动力就业、工资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刘毓芸和程宇玮，2020）。另一方面，产业扶持政策能通过信贷、税收、政府补贴和市场竞争机制影响资源和要素配置，资源和要素配置直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产业不断转型的过程中，产业扶持政策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产业扶持政策是政府影响特定产业发展的行为，主要通过发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弥补市场失灵、完善市场制度来实现。产业扶持政策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重要措施，会对微观企业的发展产生影响（李广子和刘力，2020）。在收入分配方面，已有研究基于收入分配视角考察了中央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薪酬的影响，发现产业扶持政策能提升重点行业的企业薪酬水平，通过提高普通员工薪酬而降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宋芸芸和吴昊旻，2022）。但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地方政府是产业扶持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和推动者，通过政策配套、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行政审批干预以及信贷扶持等方式推动产业扶持政策。然而，现有研究却未涉及地方政府产业扶持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地方政府产业扶持政策视角，探讨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以期完善地方政府产业扶持政策、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以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经验依据和政策启示。

相比于既有的研究文献，本文主要有如下边际贡献：

第一，丰富了产业政策相关的经济学文献，产业政策是我国类型最多、普及面最广的宏观政策之一，产业政策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伟大成就有着重要作用（江飞涛和李晓萍，2018），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有关产业扶持政策的理论讨论和经验分析已经很多，但大多是对中央政府产业扶持政策的分析，较少涉及地方政府产业扶持政策，尤其是其对于微观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关注不足。地方政府是实施产业扶持政策的重要抓手，因此本文以地方政府出台的产业扶持政策为研究对象，探究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这不仅有利于中央和地方更加全面地认识产业扶持政策的经济效应，同时也为地方政府在协同产业扶持政策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新思路，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本文从研究内容上拓展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文献。一方面，本文基于

地方政府出台的“五年规划”识别出地方产业扶持政策指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如何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丰富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文献。以五年规划为主导的产业扶持政策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点。五年规划中，中央政府会明确提出未来扶持或重点扶持的产业。为了实现五年规划的产业发展目标，各级地方政府往往会采用财政、金融、税收以及投资准入等手段将资源导向扶持产业（宋凌云和王贤彬，2013）。现有文献虽然已从多个宏观政策探讨了其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但对地方产业扶持政策的关注不足（肖土盛等，2023）。另一方面，既有文献大多基于上市公司企业数据或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江轩宇和朱冰，2022；陆雪琴和鲁建坤，2022），而本文基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探究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相比工业企业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更具优势，它不仅涵盖了规模以上企业和上市公司，还包含大量的小微企业。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是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按照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企业填报，包含国民经济全部行业每年约 70 万家的样本和企业层面丰富详实的税收相关数据和财务数据（赵仁杰和范子英，2020），这进一步保证了研究数据的可靠性。

第三，本文为厘清产业扶持政策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路径提供了新证据。一方面，本文基于劳动收入份额指标分解方面探究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如何通过相应措施影响企业平均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本文基于传导机制检验发现地方产业扶持政策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生产技术升级和市场竞争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这不仅有助于厘清产业扶持政策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传导路径，提高产业扶持政策与收入分配的协同性，还为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二、背景介绍、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产业扶持政策背景介绍

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制定的一系列调控产业结构及行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政策总称。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不管是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还是正处于经济赶超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都曾是或正是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开始全面推行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广泛存在于许多领域中，成为中国经济管理与经济调控颇为重要的工具（江飞涛和李晓萍，2018）。产业政策一般包含目标、工具和对象三个内容。目标是发展什么产业，工具是用什么样的政策促进产业发展，对象是扶持谁和支持谁。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了“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新兴数字产业”、“加快发展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产业”、“加快发展健康、养老、托育、文化、旅游、体育、物业等服务业”^①。为完成上述产业政策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借助行政审批、财政金融以及等平台建设等工具出台一系列支持产业政策目标实现的措施，如

^①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和拓宽多元化直接融资渠道。

每个五年（计划）规划时期中央都会出台重点产业扶持政策，而且其重要性也越来越为突出。在中国现有体制下地方政府有很大的积极性与自主权来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而产业扶持政策就成为地方政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而且从央地关系来看，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的产业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推动与实现的。在中国的集权型政治体制下，五年规划和产业扶持政策的实施，会为地方政府带来更多的资源和更强的正向外部性，满足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等一系列的需求。因此，地方政府会积极主动地根据五年规划与产业扶持政策的文件内容，制定当地的五年规划与产业扶持政策，以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与资源。我国各省在发展状况上具有较大差异，由于中央在制定产业扶持政策时更多地考虑总体性和全局性，省级政府在产业扶持政策的细化上能够发挥较强的自主性，往往在响应中央号召时，会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调整政策的具体内容。随着省级政府自主权的增强，在发展经济、制定产业扶持政策时，各省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一方面，省级产业扶持政策在形式上对国家重点规划发展的产业作出了回应；另一方面，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资源禀赋的不同，各省则更倾向对既符合国家规划、又具有地方优势的产业予以重点支持。

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出台的产业扶持政策要致力于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就成为其引导微观企业的重要任务。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往往直接对企业提出行动目标，并与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劳动政策、金融政策等联动配合，系统性地推动扶持产业持续发展，进而实现产业政策目标，将其从“重点行业”发展为“优势产业”再打造为“支柱产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在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目标下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将市场要素有序组织起来，弥补本地市场在要素配置方面的各种缺陷，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产业政策文献回顾

对于产业扶持政策的政策效果，诸多文献从宏观视角探讨了产业扶持政策的影响（孙伟增等，2018；Crisuolo et al., 2019），这类研究主要从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产能过剩、资源配置、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地区就业等方面展开。例如，韩永辉等（2017）发现产业扶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纠正市场失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随着产业政策的进一步发展，诸多文献也开始拓展至产业扶持政策的微观效应方面。产业扶持政策通过银行信贷和政府补贴扶持目标产业，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微观企业的融资约束和资本结构（Chen et al., 2017）。融资是企业投资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产业扶持政策不仅会通过行政手段放宽企业投资限制，也会对企业投资依赖的资金来源和融资产生明显影响，因此产业扶持政策的经济效应也会体现在企业投资及企业投资效率方面（王克敏等，2017）。此外，部分学者认为，重点产业扶持政策可以显著提高被扶持行业或企业的生产效率。产业扶持政策会给重点支持行业带来短期融资优势，并通过信贷、税收、政府补贴和市场竞争机制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动机，促进企业创新（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提高企业竞争优势（Aghion et al., 2015）。融资优势、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竞争优势都会对企业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因此产业扶持政策的实施会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现有文献已发现国家产

业扶持政策的实施能提高企业薪酬水平，然而未进一步探讨其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宋芸芸和吴昊旻，2022）。因此，立足于地方政府视角，政府出台的产业扶持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仍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融资约束

融资约束是制约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重要因素，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阶段我国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一般情况下企业都需要借助债务融资和债券融资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为企业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企业员工薪酬水平提供物质条件（Neumeyer & Perri，2005；汪伟等，2013）。此外，当融资约束较严重以及债务融资成本较高时，企业可能会降低劳动投入的需求，会倾向减少劳动力雇佣或压缩员工工资水平，最终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地方政府推行产业扶持政策主要通过直接干预和间接引导方式，对受扶持产业的企业给予各种优惠和政策扶持，具体包括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以及信贷倾斜等。一方面，产业扶持政策的实施传递了国家鼓励发展的方向和特定产业发展前景，可以减少贷款成本中包含的信息垄断租金（Hale & Santos，2009），改善鼓励行业的外部信贷融资约束（韩永辉等，2017）。同时，地方政府将通过贷款利率优惠、设立专项基金等多种方式来为重点产业中的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融资环境鼓励信贷资金向产业扶持政策支持的行业倾斜，缓解扶持企业面临的信贷歧视，进而减少贷款成本中包含的市场垄断租金（戴国强和钱乐乐，2017），降低银行贷款成本。企业融资成本的降低将有助于优化劳动要素结构，增加企业劳动要素的投入，进而有助于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优惠方式缓解企业面临的内源融资约束，增加企业现金流（余明桂等，2016），为企业扩大再生产提供支持资金。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会增加劳动需求，创造就业机会，促使企业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已有众多研究证实重点产业扶持政策能够改善企业外部融资环境，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王克敏等，2017；Chen et al.，2017）。因此本文认为产业扶持政策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来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2. 生产技术升级

在产业扶持政策实施阶段，地方政府为鼓励重点产业发展，会进一步放松重点产业的项目审批和市场准入，允许更多企业进入，进而增加了重点产业的市场竞争程度。随着市场竞争变得愈加激烈，扶持产业内的企业会主动增加研发投入，通过生产技术升级来提升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同时，地方产业扶持政策也会为激励企业增加研发动机而出台一系列与研发项目相关的财政补助和税收抵免政策，降低企业的创新风险和研发创新的边际成本，推动企业开展持续性的创新活动，促使企业生产技术升级（林洲钰等，2013）。产业扶持政策具有竞争兼容性，重点产业扶持政策能影响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强度（Aghion et al.，2015）。此外，获得产业扶持政策支持的企业能向外界传递企业受扶持、具有资源获取优势、值得信任的积极信号，促使企业更有效地获取外部资金，缓解创新活动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余明桂等，2016）。

在生产技术升级的推动下，企业将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投入更多资源引进高边际生产率的劳动要素（王雄元和黄玉菁，2017），促使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新技术和新方法是推动企业生产技术升级的关键因素（Moshirian et al., 2021），这些关键因素大多蕴含在人力资本里面（江轩宇等，2019）。因此，产业扶持政策在促使企业增加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也会提升企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为吸引高人力资本而提高薪酬水平，提升高技能人才的雇用比例，增加其对高技能人力资本的投入强度，进而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已有研究表明研发投入和生产技术升级能提高企业生产率（周亚虹等，2012），而企业员工平均工资与企业生产率正相关（Bernard & Jensen, 1999），因此产业扶持政策能够通过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生产技术升级影响企业平均工资，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3.市场竞争程度

产业扶持政策的作用之一是修正“市场失效”，具体表现为促进合理有效的竞争，而非强化垄断，减少企业间的市场信息不对称性。产业扶持政策会通过放松项目审批和市场准入限制等方式，增强市场整体竞争活力。放宽行业准入限制降低了企业进入壁垒，从而促使企业在市场中自由进出，营造市场竞争激励的营商环境，促使企业提高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Aghion et al. (2015) 也认为产业扶持政策会促进市场形成竞争效应，有效强化市场公平竞争和充分竞争，降低市场垄断程度。市场垄断的降低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劳动要素价格（黄凌云等，2023），进而增加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因此，产业扶持政策可以通过提高市场竞争程度而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地方产业扶持政策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生产技术升级以及提高市场竞争程度来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为检验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本文使用 2008-2015 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相比其他微观企业数据，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覆盖范围非常广且准确度高，不仅涵盖各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还涵盖各行业中小微企业，比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更具全面性。

本文参考 Liu & Mao (2019)、赵仁杰等 (2022) 的做法，对 2008-2015 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进行了相应处理，第一，根据企业纳税识别号对每年重复的样本进行了剔除。第二，根据企业所属国民经济行业代码将行业调整至《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以避免 2011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变动带来的行业误差。第三，剔除不符合会计准则的企业，如企业员工人数等于零或缺失，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总资产、固定资产、营业收入等关键指标等于零、负值或缺失，以及利润总额大于营业收入、流动资产大于总资产等。

重点产业扶持政策信息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的产业政策研究数据

库 (Industrial Policy Research Database, IPRD)。本文结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01》,手工整理了 2006-2020 年中国省级政府“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中受到扶持的地方产业政策,然后将其与 2002 版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进行匹配,识别出地方政府产业扶持政策。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CNRDS) 的区域经济研究数据库 (CRED) 以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 变量定义

1. 因变量: 劳动收入份额 (LS)

参考方军雄 (2011)、江轩宇和林莉 (2022) 等的做法,本文基于要素成本法增加值的概念来计算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具体采用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除以企业增加值,再乘以 100 来衡量劳动收入份额 (LS)。其中,企业增加值=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固定资产本年折旧。

2. 核心解释变量: 地方产业政策 (IP)

借鉴张莉等 (2019) 的做法,并结合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能够获取的样本区间,本文以 2006-2015 年中国省级政府出台的“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作为研究区间。首先,根据五年规划纲要识别出“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及的相关产业,对五年规划中提及的产业进行标准化分类^①,随后根据五年规划中对提及产业的描述语气将提及产业分为鼓励产业、中性产业和抑制产业^②。其次,在政策明确鼓励的产业中进一步筛选政策重点支持的行业,整理出各省在五年规划中重点支持的产业^③。最后,将各省“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的重点产业统一匹配至《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中对应的两位行业代码。本文将各省级政府出台的五年规划文件中重点支持的产业视为受到地方产业政策扶持的行业,如果该行业处于“五年规划”实施的年份和省份,则将地方产业政策变量 IP 赋值为 1,反之赋值为 0。省级政府出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中提到的重点产业本质上是地方产业倾斜式发展的产业扶持政策。地方政府借助规划中的产业扶持政策发挥目标导向作用,优化产业结构升级 (林毅夫, 2007),发挥产业集聚的经济优势。

3. 控制变量

除地方产业政策外,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多,如企业生产率等。因此,本文参考杜鹏程等 (2021)、彭飞等 (2022) 的研究,在模型中加入一系列的控制变

① 标准化分类是指采用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01”,对五年规划提及的产业进行标准化分类,使其与国民经济行业保持一致。

② 鼓励产业的具体评判标准是五年规划中提及的产业冠以诸如壮大规模、积极发展、加速发展、潜力产业、先导产业、优势产业等词汇;中性产业的具体评判标准是五年规划中提及的产业冠以诸如合理发展、规范发展、调整优化、转型升级、改造提升等词汇;抑制产业的具体评判标准是五年规划中提及的产业冠以诸如适当控制、改组改造、压缩规模、逐步淘汰、限制发展、有序转移等词汇。

③ 筛选重点支持行业的方法:在政策明确鼓励的产业中,部分产业会冠以“重点扶持”、“支柱产业”、“优先发展产业”等词语引导,这类产业都视为未来五年规划中政策重点支持产业。例如:全国十一五规划中提到“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则“现代物流业”视为政策重点支持产业。

量以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依次为：（1）企业规模（*Size*），采用企业年末总资产的对数值来表示；（2）资产负债率（*Lev*），采用企业年末总负债与企业年末总资产的比值来表示；（3）资产收益率（*Roa*），采用企业净利润占企业年末总资产的比重来表示；（4）盈利能力（*profie*），采用营业利润与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表示；（5）现金流量（*cash*），采用企业现金流量占企业年末总资产的比值来表示；（6）政府补贴（*sub*），采用企业补贴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来表示；（7）出口虚拟变量（*xpdum*），如果企业本年出口货物销售额大于零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依次为：（1）经济发展水平（*pgdp*），采用地区人均 GDP 的对数值来表示；（2）产业结构（*IS*），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表示；（3）人口密度（*pop*），采用地区常住人口数与地区行政面积的比值来表示；（4）职工平均工资（*wage*），采用地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对数值来表示；（5）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表 1 汇总了本文主要变量的定义和说明。

表 1 主要变量的含义及说明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i>LS</i>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企业增加值) × 100
<i>IP</i>	地方产业扶持政策	将各省级政府出台的五年规划文件中重点支持的产业视为受到地方产业政策扶持的行业，如果该行业处于“五年规划”实施的年份和省份，则赋值为 1，反之赋值为 0
<i>Size</i>	企业规模	企业年末总资产的对数值
<i>Lev</i>	资产负债率	企业年末总负债与企业年末总资产的比值
<i>Roa</i>	资产收益率	企业净利润占企业年末总资产的比重
<i>profie</i>	盈利能力	营业利润与营业收入的比值
<i>cash</i>	现金流量	企业现金流量占企业年末总资产的比值
<i>sub</i>	政府补贴	企业补贴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i>xpdum</i>	出口虚拟变量	如果企业本年出口货物销售额大于零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i>pgdp</i>	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人均 GDP 的对数值
<i>IS</i>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值
<i>pop</i>	人口密度	地区常住人口数与地区行政面积的比值
<i>wage</i>	职工平均工资	地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对数值
<i>FDI</i>	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三）模型构建

本文借助省级政府出台的“五年规划”来考察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借鉴肖土盛等（2022）的研究，构建以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LS_{ipt} = \alpha_0 + \beta_0 IP_{ipt} + \theta_0 Controls1_{it} + \theta_1 Controls2_{pt} + \delta_i + \mu_t + \varepsilon_{ipt} \quad (1)$$

其中，*i*、*j*、*p*、*t* 分别表示企业、行业、省份和年份。被解释变量 LS_{it} 为企业 *i* 在 *t* 年的劳动收入份额，解释变量 IP_{ipt} 表示地方产业扶持政策。 $Controls1_{it}$ 和 $Controls2_{pt}$ 分别表示企业层面和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 δ_i 和 μ_t 分别代表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ε_{ipt} 表示

随机扰动项。此外，本文将稳健标准误聚类在企业层面。本文主要关注模型（1）中解释变量 IP 的估计系数 β_0 的显著性。根据前文的理论假说，如果估计系数 β_0 显著为正，则意味着地方产业扶持政策能提高受产业扶持政策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符号	最小值	平均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标准差
LS	0	33.0940	29.8795	99.9993	21.42
IP	0	0.3702	0	1	0.483
$Size$	0	10.0637	9.9745	23.4282	2.217
Lev	0	0.6298	0.6426	2.4746	0.376
Roa	-0.7380	0.0201	0.0075	0.4977	0.120
$profie$	-0.9999	0.0137	0.0060	489.6667	0.535
$cash$	0.0002	1.9827	1.1532	19.2393	2.764
sub	0	0.0064	0	0.2257	0.0257
$xpdum$	0	0.1816	0	1	0.386
$pgdp$	9.0852	10.5791	10.6239	11.5895	0.536
IS	0.2478	1.1674	1.2031	2.0016	0.372
pop	2.3771	714.7234	410.2071	3826.2920	931.3
$wage$	9.9523	10.6100	10.5491	11.6208	0.353
FDI	0.0007	0.0288	0.0249	0.0819	0.0193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报告了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为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结果，结果发现解释变量 IP 的系数为 0.1598，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地方产业扶持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第（2）列中进一步控制了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结果发现解释变量 IP 的系数为 0.2319，依然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第（3）列中进一步加入了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解释变量 IP 的系数为 0.2767，依然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综合来看，地方产业扶持政策会显著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支持了前文研究假说。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IP	0.1598*** (0.053)	0.2319*** (0.063)	0.2767*** (0.063)
企业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3.6292*** (0.021)	61.0186*** (0.601)	21.5520** (8.927)

样本量	1619820	986704	986704
R ²	0.6958	0.7263	0.7268

说明：*、**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表同。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性标准误，下表同。

（二）内生性处理

前文研究结论可能面临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地方产业扶持政策既可能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同时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企业本身也可能属于重点支持的产业，从而引起估计偏差问题。此外，模型设定偏误、非观测到的潜在影响因素、变量测量误差以及遗漏变量等问题均能引起内生性问题。为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以“十二五规划”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DID)来估计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净影响。此外，在接下来的稳健性检验中，一方面，本文采用控制“行业—年份”联合固定效应、“省份—年份”联合固定效应以较好地吸收行业、地区以及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以缓解潜在影响因素以及遗漏变量问题。另一方面，本文还采用了更换核心变量指标、更换研究样本等方式，以缓解变量测量误差问题。

1. 准自然实验：双重差分法

借鉴王贤彬和谢倩文（2021）的做法，本文以各省级政府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如下双重差分模型：

$$LS_{ipt} = \alpha_1 + \beta_1 DID_{ipt} + \theta_2 Controls1_{it} + \theta_3 Controls2_{pt} + \delta_i + \mu_t + \varepsilon_{ipt} \quad (2)$$

其中， $DID_{ipt} = treat_{ip} \times post_t$ ， $treat_{ip}$ 为分组变量， $post_t$ 为时间虚拟变量。借鉴已有研究的思路，如果该企业所属行业在“十一五规划”中不是重点产业，而在“十二五规划”中是重点产业，则 $treat_{ip}$ 为实验组，赋值为 1。若该企业所属行业在“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中均不是重点产业，则 $treat_{ip}$ 为对照组，赋值为 0。由于各省份的“十二五规划”均是在 2011 年开始执行，因此若年份在 2011 年及以后，则 $post_t$ 赋值为 1；若年份在 2011 年之前，则 $post_t$ 赋值为 0。对于企业所属行业在“十一五规划”中是重点产业，而在“十二五规划”中不是重点产业，以及在“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中均是重点产业的样本企业，本文给予剔除，采用剔除之后的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其余变量含义同模型（1）。交互项系数 β_1 刻画了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含义是：与“十二五规划”实施期间的非重点产业相比，“十二五规划”实施期间重点产业中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在“十二五规划”期间的相对变化幅度。

表 4 展示了基于模型（2）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中仅包含固定效应，交互项 DID 的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第（2）列中包含了固定效应和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系数依然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第（3）列中包含了固定效应和全部的控制变量，此时交互项 DID 的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总体而言，上述结果表明地方产业扶持政策能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说明采用准自然实验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研究结论依然是稳健可靠的。

表 4

DID 回归结果

	(1)	(2)	(3)
<i>DID</i>	0.5541*** (0.082)	0.3128*** (0.096)	0.2145** (0.096)
企业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2.6482*** (0.012)	59.8898*** (0.713)	-6.8040 (11.139)
样本量	1054788	647892	647892
R ²	0.7018	0.7327	0.7330

2.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平行趋势假设是双重差分估计结果可靠的重要假设,为验证双重差分估计结果的准确性以及排除反向因果的可能性,本文进一步检验地方政府实施“十二五规划”之前重点产业与非重点产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平行趋势。借鉴 Qian(2008)的思路,生成年度虚拟变量 *Year* 与分组变量 *treat* 的交互项,将其替换模型(2)中的 *DID* 进行回归,平行趋势假设检验结果如图 1 所示。其中,圆点表示每个时间点(年份)对应的回归系数,虚线表示 95%置信区间。结果显示,政策实施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企业间的劳动收入份额不存在系统性差异,而仅在政策实施后,回归系数有明显的上升且显著异于 0。这表明本文研究样本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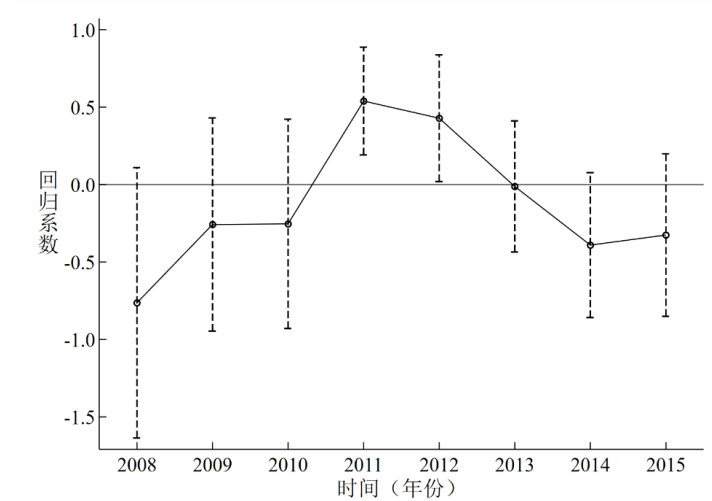


图 1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图

(三) 稳健性检验

1. 更换被解释变量指标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核算方法以及以往有关劳动收入份额的文献,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具有多种衡量方式(詹新宇和余倩, 2022)。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衡量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并重新基于模型(1)进行回归检验。不同的衡量方式具体如下:第一,为

避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指标的百分数在[0, 100]之间的波动可能会对计量估计结果产生估计偏误问题, 本文借鉴李稻葵等(2009)的思路, 采用 Logistic 转换将其区间映射至 $(-\infty, +\infty)$ 区间, 即采用 $LS / (100 - LS)$ 再取自然对数的方式衡量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记为 $LS1$ 。第二, 借鉴胡奕明和买买提依明·祖农(2013)的研究, 本文采用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除以企业年末总资产数衡量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记为 $LS2$ 。第三, 借鉴周茂等(2018)、张明昂等(2021)的研究, 本文采用收入法计算企业增加值,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LS3 = \text{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text{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text{营业利润} + \text{固定资产本年折旧} + \text{生产税净额}) \times 100$, 其中生产税金额等于“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值税-政府补助”。第四, 借鉴施新政等(2019)的研究, 本文采用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除以营业总收入再乘以 100 衡量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记为 $LS4$ 。表 5 第 (1) - (4) 列报告了更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的检验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 改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衡量指标后, 解释变量 IP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表明本文研究结论稳健可靠。

2. 更换研究样本

由于本文所采用的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在时间上具有一定局限性, 本文进一步采用 2011-2020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基于各省级政府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整理地方政府在 2011-2020 年的地方重点产业扶持政策, 随后基于模型 (1) 重新检验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其中, 被解释变量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以及控制变量的指标衡量与模型 (1) 中基本一致^①, 估计结果如表 5 第 (5) 列所示。结果显示, 解释变量 IP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表明更换研究样本之后本文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地方产业扶持政策能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表 5 更换变量衡量方式和研究样本的检验结果

	(1)	(2)	(3)	(4)	(5)
	改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衡量指标				更换研究样本
	$LS1$	$LS2$	$LS3$	$LS4$	
IP	0.0200*** (0.004)	0.1992* (0.117)	0.2067** (0.083)	0.0713* (0.042)	0.6299* (0.37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1876** (0.577)	-0.2251 (12.422)	114.6948*** (12.152)	37.2094*** (5.801)	85.7082*** (6.719)
样本量	986704	1057210	762499	1029052	26260
R^2	0.6922	0.4898	0.7540	0.7654	0.8027

说明: 控制变量包含企业控制变量和省级控制变量, 下同。

^① 更换研究样本的稳健性检验中, 本文还对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了相应的筛选和剔除, 例如剔除 ST 和退市的样本。此外, 由于上市公司数据库并未公布上市公司出口的相关信息, 因此更换研究样本后的检验不包括出口虚拟变量这一控制变量。

3. 剔除同时期其他政策的干扰

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实施同期也有其他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政策出台,这些政策可能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例如 2009 年 1 月 14 日至 2 月 25 日陆续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2009 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2012 年开始试点实施的“营改增”政策,以及 2015 年开始实施的制造强国规划。这些政策都可能会影响样本期间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

通过梳理 2009 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具体实施措施可以发现,国务院希望通过金融支持和刺激需求等渠道来促进十大产业发展,通过刺激市场需求为企业营造良好经营环境,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扩大国内市场需求,鼓励银行为企业提供贷款(钱雪松等,2018)^①。由此看来,2009 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实施可能会扩大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为了剔除此政策对本文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在模型(1)加入虚拟变量 Ten_{it} ,衡量企业 i 在 t 年份是否受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影响。由表 6 第(1)列可知,控制了 2009 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影响后,解释变量 IP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地方产业扶持政策能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2009 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对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进行了限制,这可能影响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而对本文研究结论产生影响。为排除 2009 年国企“限薪令”政策的干扰,本文进一步在模型(1)中加入虚拟变量 $Soep$,以控制 2009 年国企“限薪令”政策的影响。虚拟变量 $Soep$ 的设定如下:若企业 i 属于国有企业,则在 2009 年及以后赋值为 1;反之赋值为 0。表 6 第(2)列报告了控制 2009 年国企“限薪令”政策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解释变量 IP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剔除 2009 年国企“限薪令”政策的干扰后,地方产业扶持政策依然能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2011 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出台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简称《方案》),《方案》明确提出在上海市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率先开展营业税改增值税(简称“营改增”政策),并于 2012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随后“营改增”政策在全国各省份各行业陆续推广实施。由于本文基准回归的样本期为 2008-2015 年,与“营改增”政策推广实施的时间范围重合度很高,且“营改增”政策会通过改变资本要素相对价格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彭飞等,2022)。因此,为剔除“营改增”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在模型(1)中加入虚拟变量 $Reform_{it}$,若企业 i 在 t 年份位于“营改增”省份和行业则 $Reform_{it}$ 取值为 1,否则 $Reform_{it}$ 取值为 0,估计结果如表 6 第(3)列所示。结果显示,解释变量 IP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剔除“营改增”政策的干扰后,地方产业扶持政策依然能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在美国重点产业政策对中国重点产业进行围堵和打压的背景下,2015 年我国开始实施的制造强国规划亦可能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因此,本文进一步在模型(1)中加

① 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的十大产业具体包括汽车产业、钢铁产业、纺织工业、装备制造业、船舶工业、电子信息产业、轻工业、石化产业、有色金属产业和物流业。

入制造强国规划虚拟变量 $make_{it}$ ，若属于十大重点制造领域则在 2015 年赋值为 1，反之赋值为 0，估计结果如表 6 第（4）列所示。结果显示，解释变量 IP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剔除制造强国规划的干扰后，地方产业扶持政策依然能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在探讨重点产业扶持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时，已有研究发现国家层面的重点产业扶持政策能够对微观企业行为产生影响（余明桂等，2016）。因此，本文进一步在模型（1）中控制国家重点产业政策 $IMPIND$ ，如企业在五年规划实施时间内位于“十一五规划”（2006-2010 年）或“十二五规划”（2011-2015 年）明确鼓励或重点支持的行业，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表 6 第（5）列报告了控制国家重点产业扶持政策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解释变量 IP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在剔除国家重点产业扶持政策的干扰后，地方产业扶持政策依然能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表 6 剔除同期其他政策后的检验结果

	(1)	(2)	(3)	(4)	(5)
	十大产业振兴规划	国企“限薪令”政策	“营改增”政策	制造强国规划战略	国家重点产业政策
IP	0.2732*** (0.063)	0.2767*** (0.063)	0.2984*** (0.063)	0.2735*** (0.063)	0.2777*** (0.065)
Ten	0.2316** (0.092)				
$Soep$		0.0245 (0.119)			
$Reform$			2.0292*** (0.154)		
$make$				0.6861*** (0.157)	
$IMPIND$					-0.0053 (0.08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1.4591** (8.927)	21.6060** (8.933)	20.4803** (8.927)	21.0288** (8.927)	21.5471** (8.928)
样本量	986704	986704	986704	986704	986704
R^2	0.7268	0.7268	0.7269	0.7268	0.7268

4.采用高阶固定效应

为缓解潜在不可观测因素以及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高阶固定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控制行业、省份、“行业一年份”联合固定效应以及“省份一年份”联合固定效应以较好地吸收行业、省份以及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和行业层面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以缓解遗漏变量问题。表 7 第（1）-（3）列报告了加入高阶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第（2）列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和“行业一年份”联合固定效应，第（3）列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和“省份

一年份”联合固定效应。结果发现，表7第(1)-(3)列解释变量 *IP*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研究结论稳健可靠。

5.其他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还进行了其他稳健性检验，具体如下：第一，考虑到极端值的异常影响。本文对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基于缩尾处理之后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第二，考虑到样本期内企业破产退出以及新进入企业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进一步采用2008-2015年平衡面板数据重新进行回归。第三，席卷全球的2008年金融危机对微观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均有重大影响，可能给本文估计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本文进一步剔除2008年的样本企业，重新基于模型(1)进行回归。第四，剔除国家计划单列市的影响。经过一系列调整现保存的国家计划单列市被国家赋予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这些城市在中央各项年度计划中均被单列出来，与省级行政区并列。因此，国家计划单列市的产业扶持政策可能更加受国家产业扶持政策影响，可能与所在省份的产业扶持政策并不能完全一致，进而可能导致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偏误^①。鉴于此，本文进一步剔除处于国家计划单列市的企业样本，重新基于模型(1)进行回归。上述其他稳健性检验的检验结果如表7第(4)-(7)列所示，解释变量 *IP*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研究结论稳健可靠。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7)
	高阶固定效应			缩尾处理	平衡面板数据	剔除金融危机影响	剔除国家计划单列市
<i>IP</i>	0.2870*** (0.070)	0.2060*** (0.072)	0.1675** (0.067)	0.2873*** (0.060)	2.4522*** (0.819)	0.2428*** (0.064)	0.2564*** (0.06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常数项	17.4771** (8.904)	21.2782** (9.013)	60.8736*** (0.600)	23.1542*** (8.232)	22.5905 (14.239)	64.7334*** (10.126)	-4.8255 (9.417)
样本量	986696	986678	986704	986704	49979	853054	886105
R ²	0.7271	0.7286	0.7296	0.7570	0.2347	0.7545	0.7249

五、机制检验与分析

(一) 劳动收入份额指标分解的机制检验

^① 国家计划单列市：大连市、青岛市、宁波市、厦门市和深圳市。

依据经典的欧拉方程分解，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可分为劳动者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罗明津和铁瑛，2021），劳动者报酬与劳动生产率的比值越大，则劳动收入份额越高。实际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关键原因之一正是劳动生产率的持续上升。本文借鉴魏下海等（2013）的思路，假设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既定约束下选择最优投入组合，得到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资本和劳动）相对价格之间的关系。基于经典的欧拉方程，对于一次齐次的生产函数，企业产出恰好对应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指标 LS 可被分解为如下表达式：

$$LS = \frac{wL}{Y} = \frac{w}{Y/L} \quad (3)$$

同时在式（3）两边取对数可得：

$$\ln LS = \ln w - \ln(Y/L) \quad (4)$$

式（4）中， w 为企业员工平均工资， Y/L 为企业劳动生产率。在式（4）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对企业员工平均工资 w 和企业劳动生产率 Y/L 进行分解，分解后如下式：

$$\ln w = \ln\left(\frac{W}{L}\right) = \ln W - \ln L \quad (5)$$

$$\ln(Y/L) = \ln Y - \ln L \quad (6)$$

式（5）和式（6）中的 W 为企业员工工资总额， L 为企业员工总人数， Y 为企业增加值。地方产业扶持政策通过改变要素相对价格，调整企业最优要素配置，从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式（4）、式（5）和式（6）表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取决于企业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企业员工工资总额、员工人数以及企业增加值。由此本文基于模型（1）分别检验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企业工资总额、企业增加值以及企业员工人数的影响。

本文采用企业工资总额除以企业员工人数后再取对数来衡量企业平均工资 $Pwage$ ，将其作为新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8 第（1）列所示。结果显示，解释变量 IP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方产业扶持政策能显著提升处于重点产业的企业平均工资。采用企业本年增加值除以企业员工人数后再取对数来衡量劳动生产率 LP ，将其作为新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8 第（2）列所示。结果显示，解释变量 IP 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表明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的效果。上述检验结果表明地方产业扶持政策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平均工资而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分别采用企业员工工资总额的对数值来衡量工资总额 W 、采用企业本年增加值的对数值来衡量企业增加值 Y 、采用企业员工总人数的对数值来衡量企业员工人数 L 。基于模型（1）实证检验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工资总额、企业增加值以及企业员工人数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 8 第（3）-（5）列所示。结果显示，解释变量 IP 的系数在第（3）列和第（5）列中显著为正，在第（4）列并不显著，说明地方产业扶持政策显著提高了重点产业的企业工资总额和员工人数，并未促进企业增加值的提升。综合来看，地方产业扶持政策提升了企业的劳动要素投入和用工需求，

但由于企业工资上涨幅度大于员工上涨幅度，进而提高了企业员工平均工资。地方产业扶持政策通过提升劳动要素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而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表 8 劳动收入份额指标分解的机制检验结果

	(1)	(2)	(3)	(4)	(5)
	企业平均工资 <i>Pwage</i>	劳动生产率 <i>LP</i>	工资总额 <i>W</i>	企业增加值 <i>Y</i>	企业员工人数 <i>L</i>
<i>IP</i>	0.0120*** (0.003)	-0.0039 (0.008)	0.0209*** (0.003)	0.0041 (0.008)	0.0089*** (0.0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0044*** (0.436)	-5.6392*** (1.209)	5.7484*** (0.484)	-3.8523*** (1.210)	2.7440*** (0.334)
样本量	986704	482260	986704	482260	986704
R ²	0.7428	0.6532	0.9267	0.8124	0.9515

(二) 影响渠道的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预期地方产业扶持政策的实施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生产技术升级和促进市场竞争程度这三个渠道来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为验证前文对于影响渠道的分析，本文进一步分别检验地方产业扶持政策是否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生产技术升级以及市场竞争程度。

1. 融资约束

基于已有文献，本文选取企业利息总支出与企业总负债的比值来衡量企业融资约束水平，利息支出占比越大，表明企业融资成本越高，企业融资受到的约束程度越严重（周上尧和王胜，2021）。随后本文将融资约束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模型（1）中的其余变量均不变，基于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9 第（1）列所示。结果显示，解释变量 *IP*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地方产业扶持政策的实施显著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地方产业扶持政策能通过降低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2. 生产技术升级

企业在生产技术升级过程中将引致高技能劳动的投入增加，进而会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肖土盛等，2022）。因此，本文参考崔惠玉等（2022）的思路，采用企业“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研发投入与企业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衡量生产技术升级，随后将生产技术升级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保持模型（1）中的其余变量均不变，基于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9 第（2）列所示。结果显示，解释变量 *IP*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地方产业扶持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技术的升级。结合前文理论分析可知，地方产业扶持政策能通过促进企业生产技术升级来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3. 市场竞争程度

已有文献指出，2008 年之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主导机制是市场竞争效应，

市场竞争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关键因素 (Loecker et al., 2020)。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会直接影响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 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肖土盛等, 2023)。而前文理论分析认为, 地方产业扶持政策能够进一步降低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 促进市场竞争, 进而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鉴于此, 本文通过构造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市场竞争程度, 赫芬达尔指数数值越大则表示行业内企业规模分布的不均匀程度越高, 市场垄断特征越明显, 即市场竞争程度较低。随后将市场竞争程度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 保持模型 (1) 中的其余变量不变, 基于模型 (1) 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9 第 (3) 列所示。结果显示, 解释变量 *IP*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地方产业扶持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市场竞争。同时, 结合理论分析可认为, 地方产业扶持政策能通过促进市场竞争来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表 9 影响渠道的检验结果

	(1)	(2)	(3)
	融资约束	生产技术升级	市场竞争
<i>IP</i>	-0.0312* (0.016)	0.6696* (0.347)	-0.0012*** (0.00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3.6105*** (2.350)	-120.0000 (89.526)	0.1081*** (0.034)
样本量	883500	92651	986704
R ²	0.6568	0.2907	0.5952

六、扩展性研究

(一) 异质性分析

1. 企业规模异质性

小微企业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是社会发展和稳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根据 OECD 的数据, 小微企业贡献了社会 2/3 以上的就业和 1/2 以上的社会增加值。但小微企业竞争力较差, 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 面临较强的生存压力 (李昊楠和郭彦男, 2021)。小微企业由于处于弱势地位, 其受到地方产业扶持政策资源配置、政策支持的效果相比中大型企业可能较小。2008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 小微企业是指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 万元, 从业人数不超过 100 人, 资产总额不超过 3000 万元的企业。参照这一标准, 本文将样本分为小微企业样本和非小微企业样本, 并基于模型 (1) 进行分组回归。表 10 第 (1)、(2)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小微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没有显著影响, 但对非小微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在劳动收入份额方面, 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小微企业的影响相对中大型企业较小。

2. 企业产权异质性

在资源要素分配方面, 地方政府会将更多资源优先分配给国有企业 (allen et al., 2005)。

因此，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相对没有那么重要。对于外资企业，由于地方政府一般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均会给予其较好的优惠措施，同时也十分重视外资企业在辖区内的发展，持续给予其更多资源，进而导致地方产业扶持政策的影响弱化。相比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面临着较大的资源获取困境，如民营企业遭遇的信贷歧视更高，融资约束更强（李广子和刘力，2009）。因此，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实施带来的扶持政策和优惠措施对民营企业的效果更明显，民营企业对产业扶持政策带来的优惠更加敏感。另外，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本身就显著高于民营企业（陆正飞等，2012），地方产业扶持政策所能发挥的边际增量作用有限。鉴于此，本文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将样本分为民营企业样本、国有企业样本和外资企业样本，并基于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10 第（3）-（5）列所示。结果显示，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但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没有显著影响。检验结果验证了上述推断，表明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更大。

表 10 异质性检验结果

	(1)	(2)	(3)	(4)	(5)
	企业规模异质性		产权异质性		
	小微企业	非小微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
<i>IP</i>	0.1953 (0.143)	0.2535*** (0.072)	0.3417*** (0.079)	-0.2221 (0.248)	0.1456 (0.12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3.6218 (21.006)	13.8699 (10.307)	4.4506 (10.957)	10.9971 (31.645)	63.4226*** (20.033)
样本量	272489	654016	701225	65352	198420
R ²	0.6958	0.7426	0.7232	0.7324	0.7452

3.劳动密集度异质性

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劳动雇佣具有激励效应，尤其是对于劳动密集度较高企业，刺激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可能促使劳动密集度较高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更大幅度地提升。此外，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要素投入方面远高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因此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可能在劳动密集度较高企业更大（杜鹏程等，2022）。鉴于此，本文将样本按照劳动密集度的 25% 和 75% 分位点进行分组，随后基于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11 第（1）-（3）列所示。结果显示，第（1）-（3）列交互项的估计系数逐渐增大，表明劳动密集度越高，地方产业扶持政策的实施带来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幅度越大。

表 11 异质性检验结果

	(1)	(2)	(3)
	劳动密集度 ≤ 25%	25% < 劳动密集度 < 75%	劳动密集度 ≥ 75%
<i>IP</i>	0.2132	0.2463***	0.4530***

	(0.163)	(0.089)	(0.13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5.4510 (23.348)	14.2337 (12.306)	36.6076* (19.328)
样本量	180917	463617	218068
R ²	0.7244	0.6844	0.6682

(二) 拓展分析：社保缴费负担的调节效应

依据劳动供求理论和工薪税归宿理论，社保缴费负担引致的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使企业需要支付的实际劳动力价格大于其劳动边际生产率，使得企业会相应地减少企业劳动力使用规模（Summers，1989）。企业实际承担的社保缴费负担越重，其雇佣工资越低、雇佣规模越小，社会保险以降低工资和减少就业的方式对劳动力市场运行存在双重影响。企业社保缴费的降低能减缓企业融资约束，激励企业增加劳动要素投入，进而提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张同斌等，2023）。前文研究已得出，地方产业扶持政策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生产技术升级、提高市场竞争等路径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由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问题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产业扶持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可能受到社保缴费负担的影响。因此在企业社保负担较重的背景下，本文进一步探讨社保缴费负担是否在地方产业扶持政策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本文参考赵仁杰等（2022）的做法，采用企业本年已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对数值来衡量企业社保缴费负担 $Social_burden$ ，该值越大说明企业实际承担的社保缴费负担越高。进一步地，本文设置交乘项 $IP \times Social_burden$ ，将交乘项 $IP \times Social_burden$ 和变量社保缴费负担 $Social_burden$ 加入模型（1）中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12 第（1）列所示。结果发现，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地方产业扶持政策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具有调节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产业扶持政策的促进作用。同时，本文进一步依据企业社保缴费负担 $Social_burden$ 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社保缴费负担较低样本和社保缴费负担较高样本，然后基于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12 第（2）-（3）列所示。结果显示，在社保缴费负担较低样本中，解释变量 IP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在社保缴费负担较高样本中，解释变量 IP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表明地方产业扶持政策显著提升了社保缴费负担较低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而未影响社保缴费负担较高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证明了社保缴费负担对地方产业扶持政策促进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调节效应。

表 12 社保缴费负担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

	(1)	(2)	(3)
	全样本	社保缴费负担较低样本	社保缴费负担较高样本
$IP \times Social_burden$	0.0588*** (0.016)		
IP	-0.0247 (0.102)	0.4593*** (0.122)	0.0316 (0.082)

<i>Social_burden</i>	-0.2132*** (0.01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3.5799*** (9.078)	11.8180 (17.347)	37.9429*** (11.901)
样本量	938076	390671	464907
R ²	0.7377	0.7447	0.7586

七、结论与启示

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地方政府出台的产业扶持政策这一视角出发，以劳动收入分配作为研究切入，基于2008-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产业扶持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地方产业扶持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指标分解的机制检验发现，地方产业扶持政策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平均工资来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地方产业扶持政策提高企业工资的上涨幅度大于员工上涨幅度，进而提高了员工平均工资，提高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渠道机制分析与检验发现，地方产业扶持政策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生产技术升级和市场竞争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非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更明显；劳动密集度越高，地方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效果越大。此外，拓展研究发现，社保缴费负担对地方产业扶持政策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其效果在社保缴费负担较低企业更明显。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具有鲜明的政策意义。**第一**，不断完善产业扶持政策，使其适应经济发展阶段的新要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各级地方政府在优化产业政策转型的过程中应顺应时代发展变化、满足企业发展需求，发挥产业扶持政策在要素收入分配的作用，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第二**，企业性质、企业结构以及企业规模间的差异要求地方政府在产业扶持政策的实施中要考虑产业内部间的协同。由于不同企业所处发展阶段、结构、性质以及诉求等方面都各不相同，因此，地方政府在辖区内实施产业扶持政策的过程中要协调推进，应多维地制定产业扶持政策，实行不同的产业支持方式。**第三**，地方政府应该发挥再分配职能，完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以提升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市场经济下企业负担过重会直接影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拓展研究发现企业负担过重也会导致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不明显。因此，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政府应充分利用好再分配环节的调节职能，促进企业税费负担的合理化，协调好政府、市场、企业以及劳动者的多维目标，这也是政府在促进共同富裕阶段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参考文献

- 白重恩、钱震杰, 2010:《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世界经济》第12期。
- 崔惠玉、田明睿、王倩, 2022:《增值税留抵退税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吗》,《财贸经济》第8期。
- 戴国强、钱乐乐, 2017:《关系型借贷、债券融资与企业贷款成本——基于信息与竞争机制视角的研究》,《审计与经济研究》第5期。
- 杜鹏程、刘睿雯、张烁珣, 2022:《要素成本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最低工资与进口关税的证据》,《世界经济》第2期。
- 杜鹏程、王姝勋、徐舒, 2021:《税收征管、企业避税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所得税征管范围改革的证据》,《管理世界》第7期。
- 方军雄, 2011:《劳动收入比重,真的一致下降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发现》,《管理世界》第7期。
- 宫汝凯, 2023:《走向共同富裕之路:以技术市场发展提升劳动收入份额》,《财经研究》第1期。
- 郭凯明, 2019:《人工智能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管理世界》第7期。
- 韩永辉、黄亮雄、王贤彬, 2017:《产业政策推动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了吗?——基于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经济研究》第8期。
- 何小钢、朱国悦、冯大威, 2023:《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中国工业经济》第4期。
- 胡奕明、买买提依明·祖农, 2013:《关于税、资本收益与劳动所得的收入分配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8期。
- 黄凌云、雷卓骏、王珏, 2023:《外商投资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检验》,《国际贸易问题》第2期。
- 江飞涛、李晓萍, 2018:《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产业政策演进与发展——兼论中国产业政策体系的转型》,《管理世界》第10期。
- 江轩宇、林莉, 2022:《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劳动收入份额》,《金融研究》第4期。
- 江轩宇、朱冰, 2022:《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经济学(季刊)》第4期。
- 江轩宇、朱琳、伊志宏、于上尧, 2019:《工薪所得税筹划与企业创新》,《金融研究》第7期。
- 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 2009:《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经济研究》第1期。
- 李广子、刘力, 2009:《债务融资成本与民营信贷歧视》,《金融研究》第12期。
- 李昊楠、郭彦男, 2021:《小微企业减税、纳税遵从与财政可持续发展》,《世界经济》第10期。
- 李实, 2021:《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经济研究》第11期。
- 黎文靖、郑曼妮, 2016:《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经济研究》第4期。
- 林毅夫, 2007:《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经济研究》第1期。
- 林洲钰、林汉川、邓兴华, 2013:《所得税改革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中国工业经济》第3期。
- 刘长庚、柏园杰, 2022:《中国劳动收入居于主体地位吗——劳动收入份额再测算与国际比较》,《经济学动态》第7期。
- 刘毓芸、程宇玮, 2020:《重点产业政策与人才需求——来自企业招聘面试的微观证据》,《管理世界》第6期。
- 陆雪琴、鲁建坤, 2022:《投资税收激励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东北增值税转型试点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6期。
- 陆正飞、王雄元、张鹏, 2012:《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的职工工资吗?》,《经济研究》第3期。
- 罗明津、铁瑛, 2021:《企业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金融研究》第8期。
- 彭飞、许文立、吴华清, 2022:《间接税减税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营改增”政策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6期。
- 钱雪松、康瑾、唐英伦、曹夏平, 2018:《产业政策、资本配置效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009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8期。
- 施新政、高文静、陆瑶、李蒙蒙, 2019:《资本市场配置效率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股权分置改革的证据》,《经济研究》第12期。
- 宋凌云、王贤彬, 2013:《重点产业政策、资源重置与产业生产率》,《管理世界》第12期。
- 宋芸芸、吴昊旻, 2022:《产业政策与企业薪酬安排》,《财经研究》第11期。
- 孙豪、曹肖焯, 2022:《收入分配制度协调与促进共同富裕路径》,《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4期。

- 孙伟增、吴建峰、郑思齐, 2018:《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的消费带动效应——以开发区政策为例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 王克敏、刘静、李晓溪, 2017:《产业政策、政府支持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管理世界》第3期。
- 王贤彬、谢倩文, 2021:《重点产业政策刺激制造业企业投资房地产了吗?——来自五年规划与上市公司的证据》,《经济科学》第1期。
- 王雄元、黄玉菁, 2017:《外商直接投资与上市公司职工劳动收入份额:趁火打劫抑或锦上添花》,《中国工业经济》第4期。
- 汪伟、郭新强、艾春荣, 2013:《融资约束、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与中国低消费》,《经济研究》第11期。
- 魏北海、董志强、黄玖立, 2013:《工会是否改善劳动收入份额?——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第8期。
- 肖土盛、孙瑞琦、袁淳、孙健, 2022:《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结构调整与劳动收入份额》,《管理世界》第12期。
- 肖土盛、董启琛、张明昂、许江波, 2023:《竞争政策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反垄断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中国工业经济》第4期。
- 余明桂、范蕊、钟慧洁, 2016:《中国产业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中国工业经济》第12期。
- 詹新宇、余倩, 2022:《政府补助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的模型与实证》,《财政研究》第5期。
- 张莉、朱光顺、李世刚、李夏洋, 2019:《市场环境、重点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差异》,《管理世界》第3期。
- 张明昂、施新政、纪琨, 2021:《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大学扩招的证据》,《世界经济》第2期。
- 张同斌、刘文龙、付婷婷, 2023:《〈社会保险法〉实施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6期。
- 赵仁杰、范子英, 2020:《养老金统筹改革、征管激励与企业缴费率》,《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
- 赵仁杰、唐珏、张家凯、冯晨, 2022:《社会监督与企业社保缴费——来自社会保险监督试点的证据》,《管理世界》第7期。
- 周茂、陆毅、李雨浓, 2018:《地区产业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合成工具变量的估计》,《经济研究》第11期。
- 周上尧、王胜, 2021:《中国影子银行的成因、结构及系统性风险》,《经济研究》第7期。
- 周亚虹、贺小丹、沈瑶, 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因素和产出绩效研究》,《经济研究》第5期。
- Acemoglu, D. and Restrepo, P., 2020, "Robots and Jobs: 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8 (6), 2188—2244.
- Aghion, P., Cai, J., Dewatripont, M., Du, L., Harrison, A. and Legros, P., 2015, "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7 (4), 1—32.
- Allen, F., Qian, J. and Qian, M. J., 2005,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7 (1), 57—116.
- Autor, D., Dorn, D., Katz, L. F., Patterson, C. and Reenen, V. J., 2020, "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 (2), 645—709.
- Barkai, S., 2020, "Declining Labor and Capital Shares." *Journal of Finance*, 75 (5), 2421—2463.
- Bernard, A. B. and Jensen, J. B., 1999, "Exceptional Exporter Performance: Cause, Effect, or Bo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7 (1), 1—25.
- Chen, D., Li, O. Z. and Xin, F., 2017, "Five-year plans, China finance and their consequences."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0 (3), 189—230.
- Ciminelli, G., Duval, R. and Furceri, D., 2022, "Employment Protection Deregulation and Labor Shares in Advanced Economi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04 (6), 1174—1190.
- Crisuolo, C., Martin, R., Overman, H. G. and Reenen, V. J., 2019, "Some Causal Effects of An Industrial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 (1), 48—85.
- Hale, G. and Santos, J. A. C., 2009, "Do banks price their informational monopol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93 (2), 185—206.
- Karabarbounis, L. and Neiman, B., 2014,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 (1), 61—103.
- Liu, Y. Z. and Mao, J., 2019, "How do Tax Incentives Affects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ity?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11 (3), 231—269.

Loecker, J. D., Eeckhout, J. and Unger, G., 2020, “The Rise of Market Power and the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 (2), 561—644.

Moshirian, F., Tian, X., Zhang, B. H. and Zhang, W. R., 2021, “Stock market liberalization and innov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39 (3), 985—1014.

Neumeyer, P. A. and Perri, F., 2005, “Business Cycl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The Role of Interest Rat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2 (2), 345—380.

Qian, N., 2008, “Missing Women and the Price of Tea in China: The effect of Sex-specific Earnings on Sex Imbalan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 (3), 1251—1285.

Summers, L. H., 1989, “Some Simple Economics of Mandated Benefi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9 (2), 177—183.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and Labor Income Share: Evidence from Five-year Plan Texts of Local Governments

Abstract: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e should continue to optimize the pattern of primary distribution and increase the labor remuneration of workers. As a strong lever for "active government",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continuously enhances the synergy between "active government" and "effective market", and affects the ini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local governmen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key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issued by local governments,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on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enterprises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with the help of national tax survey data from 2008 to 2015. The results show that local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of enterprises, and their effect on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of non-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s more obvious. The higher the labor intensity, the greater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on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of enterprises. The mechanism test of index decomposition shows that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mainly increases the share of enterprise labor income by increasing the average wage of enterprises. The test of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shows that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can increase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of enterprises by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promoting production technology upgrading and market competition. The extended study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soci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 burden on local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on promoting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of enterprises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and its effect is more obvious in enterprises with low social insurance payment burden. This paper not only helps to improve the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enhance the synergy of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but also provides useful policy enlightenment for optimiz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patter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Keywords: Local Governments;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y; Five-year Plans; Share of Labor Income; Income Distribution

JEL codes: D33, L52